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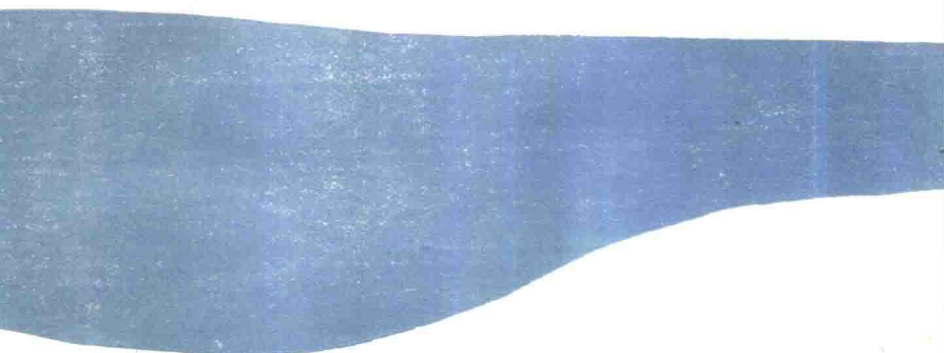


●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

裘小龙·译

抒情诗人叶芝诗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 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丛书 ●

裘小龙·译

抒情诗人叶芝诗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许大成

技术设计：吴向鸣

抒情诗人叶芝诗选

裘小龙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6 字数 116 千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400 册

书号：10374·130

定价：1.26 元

译 本 前 言

威廉·勃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现代爱尔兰著名抒情诗人, 一九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我国的外国诗歌爱好者来说, 叶芝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然而, 在我国翻译出版他的诗选, 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这第一次尝试, 译者主要选译了诗人的抒情诗。确实, 在叶芝的作品中, 抒情诗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外的批评家常常称他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位抒情诗人。称他为最后一个, 因为在狭义的现代派诗歌中, 传统的“抒情”这个概念是格格不入的, 诗更不能是诗人自己情感的直接流露。但叶芝是个抒情诗人, 而且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变化地运用他的抒情。甚至当他垂垂老矣, 他的抒情诗仍洋溢着勃勃生机。叶芝能这样始终如一, 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在现代派诗歌中, 诗人的自我往往是隐去的。不过, 抒情多少要染上个人色彩, 其实和诗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诚然, 应该把作为感受者的叶芝和作为创作者的叶芝分别对待, 就象把出现在船只上空的海鸥与船只区别开看, 但海鸥总是在船只上空盘旋的。因此我们不妨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叶芝的生平。接着我

们还将看到，叶芝的抒情诗又远远超越了个人的感受和体验。

叶芝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拉斐尔前派画家。叶芝的童年时代是在爱尔兰北部的斯来哥乡间度过的。那里他接触到爱尔兰的农民生活和民间传说，很早就对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发生了兴趣。叶芝曾进过美术学院，不久就全力以赴地写起诗来。他的处女作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杂志》上。一八八五年他的第一部诗作出版，一八八七年他在伦敦结识了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和诗人摩利斯等，受到他们风格的感染。一八八九年，他已成为略有声望的诗人，与女演员茅德·冈相遇了。茅德·冈风姿绰约，聪颖过人，充满了魅力，又是二十世纪初爱尔兰要求民族自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在叶芝的心目中自然更显得完美无缺——“有着朝圣者的灵魂”。叶芝对茅德·冈抱有终生不渝的爱慕，茅德·冈却一再拒绝了他的求婚。她在一九〇三年嫁给了一个爱尔兰军官，这场婚姻的结果是不幸的，可她十分固执，甚至在自己的婚事失意时，她与他也仅仅保持着友谊。不过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次不幸的爱情并不意味着创作的不幸。在数十年的时光里，她一直是叶芝的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叶芝为她写下了许多凄婉动人、感情真挚的诗篇。而且，或多或少地是在她的影响下，叶芝参加了爱尔兰当时的政治斗争，他的作品进入了更远大、壮丽的表现领域。一八九〇年，叶芝遇上又一个改变了他生活路程的女友，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贵族门第出身的格雷戈里夫

人，出于“封建的责任意识”，正要寻找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由她自己来充当艺术保护人的角色。她在爱尔兰西部拥有一座庄园，即叶芝诗中频频提到的柯尔庄园。她请叶芝到庄园度假，让他接触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她慷慨地给了叶芝经济援助，使他免于卖诗度日的困境。在另一方面，这一切也加深了叶芝带有贵族主义色彩的保守观点。格雷戈里夫人是个充满思想火花的剧作家。一九〇四年，叶芝、格雷戈里、约翰·辛格等一起创办了阿贝剧院。叶芝任经理，并为剧院写了许多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这期间，叶芝还写出了一些最明快、优秀的诗篇。他们这些创作活动，后来被称为“爱尔兰文艺复兴”。在叶芝看来，这是唤起爱尔兰民族意识，从而赢得民族自治的重要途径。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当时尚未成名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断断续续地任叶芝的秘书。他们的相互影响是微妙的，叶芝自然影响了庞德，但作为现代派的狂热鼓吹者，庞德也把叶芝的一些创作实践理论化了。一九一七年，叶芝转向茅德·冈的女儿伊莎尔特·冈求婚，又遭拒绝。翌年，叶芝娶了乔治·海德·利斯为妻。在离柯尔庄园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倾颓的古塔，叶芝花了一大笔钱把它买下修复后，携带他的妻子住了进去。这是一个黯黑而又浪漫的幽居。在叶芝诗意的想象中，与其说它是一处栖身之所，还不如说是一个象征。残破的塔顶象征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遭际，塔的本身却体现着往昔的传统和精华。据说，斯威夫脱也曾在附近住过，也许还登攀过塔内的旋梯；从高塔上俯瞰，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婚后不久，叶芝的妻子开始在夜间喃喃自语，尽说些神秘的话，还搞起所谓的“自动写作”。叶芝原就深信神秘主义那一套，真把这当作是神授的。其实，叶芝聪明的妻子只是为了满足她丈夫精神上的某种需要，才玩了这套小把戏。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孩子。爱尔兰经过斗争，获得了自治领的地位，从一九二二年起叶芝任自治领参议员，全家搬到都柏林居住。在他的晚年，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外，叶芝创作了他最为成熟的作品。他主编《牛津英国诗选》，和现代派诗人有了广泛的接触；他总结了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技巧，而又去芜存菁，为现代派写下他自己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一页。一九三四年，他的腺瘤动了手术，他的作品反而迸发出一股空前的热情。他于一九三九年病逝，他在最后的一封信里写道：“人们能体现真理但不能认识真理……抽象之物不是生命，处处却存在矛盾”。

在他的生活中，叶芝试图找到一种统一性，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无法解决的矛盾的环境里。然而在他的抒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统一性。正如他自己常做的一个比喻，艺术就象一棵树那样成长发展，花叶虽会呈现种种变化，但根是同一的，是深深扎在这一块土壤里的。国外的评论家常把叶芝的诗创作分成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着重从他抒情诗的发展先来作些艺术上的分析，探讨。

叶芝开始创作时，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统治英国

诗坛的仍是浪漫主义。斯宾塞、雪莱还有布莱克都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他往往取材于他在斯来哥乡间的生活经验，作品就获得了逼真、清鲜的色彩。《茵尼斯弗利岛》常被认为是叶芝最富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品，但诗中出现的意象“柳条屋、云豆架、蜜蜂巢”等都是清晰、具体的，仿佛能让人闻到泥土的气息，硬朗，生动，富有民间文学中一种质朴的生气，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空洞、陈腐的诗风。诚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一种逃离现实的倾向。“欢乐的英格兰”无法再作二十世纪的田园诗的背景，他只能怀着憧憬去寻找远离尘嚣的乌有乡，《印地安人给他情人的歌》即是一个例子。但在他大多数作品里，爱尔兰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更是他幻梦的背景，梦里其实还闪烁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辉。历史学家斯坦德利·奥格雷迪的著作《爱尔兰历史的英雄时期》使他获益非浅，为他的作品引进了爱尔兰的英雄主题，增添了一种历史的庄严。《谁和费古斯一起去》不愧为一篇成功地结合爱尔兰神话并具有抒情味的代表作，《尤利西斯》^①中的斯蒂芬想到他的母亲时就想到这首诗，这说明了此诗在爱尔兰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深度。诗不是一种逃避，而是要人类回到天真时代，要使爱尔兰重新成为一片充满青春活力的土地。叶芝歌唱爱尔兰的民族英雄，是为了用过去的光辉幻象挽救现时的不幸处境，但他的某些诗因而也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几乎在同一时期里，

①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代表作。

叶芝的作品还流露出一抹唯美主义的色彩，那些神秘的传说中的岛屿原在虚无飘渺间，爱情上的挫折更使他灰心绝望。于是他的笔端常冒出这种意象：“帐篷似垂下的乌发”。诗人躺着，姑娘俯在他的身上，让她长长的头发垂在他的脸上，在这个“帐篷”里，丑恶的现实消失了。《他要他的爱人安静》等诗里都有类似的描写。

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高涨激发了叶芝的热情，他从“帐篷”中走了出来。一八九九年他来到都柏林，他开始追求一种更简洁、有力、雅俗共赏的文体。这个时期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面具理论”的实验。《听人安慰的愚蠢》采用了新的布局：第三者的话和心（我）的反应，抒情诗中出现了日常口语的节奏和语调，而且角度也不再是诗人自我抒情的单一角度。抒情者仿佛有了一种距离。抒情诗往往是非个人化的^①，也就是说从第一者的抒情变成第三者的抒情。而且，这些第三者的形象与叶芝迥异，有乞丐、小丑、姑娘、老人、青年，甚至拟人化的玩偶等。这种写法称得上是叶芝对现代抒情诗的一个贡献。批评家们有时称叶芝为带上面具的叶芝，面具是各种各样的，时而观察，时而感慨，因而诗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具有一定客观性。在这些面具后，总有一个思想着的叶芝，又是主观的。诗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如果一个人真能认

① 叶芝的“非个人化”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有所不同。艾略特主要反对诗人个性的直接流露，认为诗创作是一种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的技巧的追求，不过叶芝和艾略特在反对个人直接抒情上是异曲同工的，叶芝运用这一技巧要比艾略特早。

为自己是另一个人，他就可以扩展他性格的另一面，那一面是潜在的，只是被疏忽了。姑且不论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如何，《乞丐对着乞丐喊》中的乞丐自然无法和叶芝划等号，不过乞丐确实用他辛辣的语言嚷出了叶芝自己说不出口的某些想法。同时，叶芝还在他的诗中运用了戏剧性的处理方法。

《英雄、姑娘和傻瓜》一诗把英雄和姑娘安排在一场“形而上”的争吵中，傻瓜则在一旁发感想，颇有莎士比亚戏剧中痛苦的幽默感。正因为是在这种戏剧性的冲突中，人物的种种言行举动都能充分揭示出其性格特征，抒情达到了一种新的强度。也可以说从静态的抒情、发展成了动态的抒情，扩展了诗的表现领域。当然，叶芝并没有抛弃传统的抒情方式，《1916年的复活节》不愧是出自充分继承了传统的大手笔。虽然叶芝不能完全理解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那次起义，但诗写得跌宕起伏，把叶芝的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先回忆和那些牺牲者过去的交往，他们不过是泛泛之交，相互缺少理解，其中一个（茅德·冈的丈夫约翰·麦克布赖德）甚至是他深恶痛绝的，但因为在那失败的起义中，他们显示出的献身精神，一切都变了，“一种惊人的美已经诞生”。从这一戏剧性事件引起的戏剧性抒情，再推进到带有哲学意味的沉思，先抑后扬，感人至深。

一九一八年左右，叶芝抒情诗中的象征主义技巧有了长足的进展，格调渐趋硬朗峭拔，诗艺更为炉火纯青。叶芝创建了他自己的一套象征主义体系，他的散文著作《幻象》对此有专门的阐述。叶芝在月亮的运动和盈亏中找到了包罗万

象的总象征：月明、月暗，月圆、月残都体现了叶芝向往的变化中的统一；以及主观和客观，变和不变的辩证关系。从哲学的意义来说，叶芝那一套自以为贯通天人的象征体系并不深奥，甚至是唯心的，但是他把它用来满足了艺术创作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象征是旋转的楼梯，倾颓的塔尖。“回旋”，多少带有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意味，不过叶芝的唯心史观常使他往后看，拜占庭对叶芝来说成了理想的乐园。《丽达和天鹅》是这样一首象征主义名诗。按照叶芝神秘的象征体系，历史每一循环是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位姑娘和一只鸟儿的结合开始。我们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怀孕说）引出的。而纪元前的那一番循环是由丽达和天鹅产生的。在希腊神话传说^①中，众神之王朱诺变形为天鹅，使丽达怀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纳斯特，海伦的私奔导致了特洛依战争，而克莱提纳斯特则和奸夫一起谋杀了她的丈夫阿迦门农。叶芝把丽达和天鹅的结合作为历史的开端来写，“羽毛的光荣”与“松开的大腿”之后，便是“燃烧的屋顶和塔巅”。批评家们对这首诗丰富的象征内涵众说纷纭，认为叶芝的历史透视深刻地接触到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叶芝自己也说他的“保守的读者会误解这首诗”。正因为复杂和深刻的象征，诗的感性形象得到了升华，但形象的生动、逼真、大胆、感人，使读者不用理会象征意义也能欣赏这首诗了。这是叶芝

① 这一神话故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我们根据叶芝诗的内容取其中一个。

从英国十七世纪立学派诗人“思想感性化”继承来的。

一九二九年起，叶芝围绕一个疯疯傻傻的老婆子“疯简”的形象写了一批诗，称为“疯简”组诗。这时，叶芝故意戴起一个“老傻瓜”的面具了。“疯简”是用第一人称写成，她的一些话似是而非，人们可以说她是装疯卖傻，但她是生活的过来人，她老年的智慧有一种酸苹果似的涩味。她熟知爱情是由对立而形成的，需要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她说起话来似乎漫不经心，充满了反嘲——最终的智慧就在普普通通的人中。叶芝仿佛又回到了斯来哥乡间那些朴实的贫民中。叶芝晚期作品中，有不少是用这种民谣体写成的，笔法直率粗犷，另一些作品虽思想深化，复杂化，但作为抒情诗，未免失之晦涩。在叶芝去世前的五个月，在一首题为《本·布尔本山下》的诗里，他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末三行是这样的：“对生活、对死亡/冷冷看上一眼，/骑士呵，向前！”早年的叶芝曾对资本主义世界抱有天真的幻想，晚年的叶芝终于懂得怎样“冷冷看上一眼”，但他还是要向前的。这，也可以说是他所有抒情作品中的统一性。

叶芝从事诗创作的岁月，正是英国诗坛经历了种种变迁的年代——后期浪漫派、唯美派、象征派、现代派。叶芝在每个时期都写出了优秀的抒情作品，不过，现代派（现代主义）是个不大精确的名称，现代派其实流派众多，风格绝不相同的流派都能归在它的名下，其中也可包括唯美派和象征派。这样，我们不妨把叶芝抒情诗的演变概括成从浪漫派到

现代派的演变。把叶芝列入现代派，一般说是没什么疑义的。然而，现代派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他们都是在反对后期浪漫派的浪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异口同声地抨击、抛弃浪漫主义诗人那种浅肤、伤感的抒情，他们的作品自然很少传统意义上的抒情。可是叶芝却是一个抒情诗人，而且还可称为现代派抒情诗人。

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现代派诗的出现，确实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反映。历史地看，英国新古典主义诗人抽象的理性之梦破灭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转而做起抽象的感性之梦了。毕竟资产阶级当时还能陶醉于自身的幻想。虽然诗人和社会的对立已趋尖锐，但诗人依然是有信念的，相信个人的无穷发展，社会的不断进化。于是他们直抒个人的主观情感和幻想。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激剧恶化，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畸形的物质文明，瓦解了传统的价值，淹没了往昔的情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崩溃了，个人在这个丧失了理性的世界面前感到渺小、无力、苦闷、惘然。如果诗人再是一味凭着个人的主观情感抒情——或是死抱住脱离现实的幻想，或是沉溺于脱离时代的伤感——就不能深刻地反映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and 时代，自然也不能反映他面对无法理解的外部世界时错综的内心感受。于是，以个人自我表达为主的浪漫主义式抒情就变得浅肤、无聊、空洞、天真。“天真意识”解体了，许多现代派诗人有意识地在否定的形式中看待一切“浪漫”的事

物。在他们形而上的摸索中，世界是如此荒诞、冷漠、无人情、非理性、一片混乱。他们的幻灭是那样深、人类存在的意义都成了可以怀疑的东西。“上帝死了”，历史再也不能进步了。他们的一个想当然的冲动的反应就是用荒诞对荒诞、用冷漠对冷漠，用传统文学形式的解体来对应现代世界模式的解体。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反映畸形成为畸形的反映，虽然是资本主义文明对其自身的认识有所发展的一个标志，但只是其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深刻的否定形式的思想，然而一切事物都是螺旋式发展的，它还应该有否定的另一面。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性造成的扭曲和异化，确实在现代派诗歌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但是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是否已被剥夺尽了一切美好的感情呢？叶芝在爱尔兰人民的追求和斗争中看到人类感情的更高向往。人道主义的理想总是应该存在着，那当然也就应该存在着抒情的作品。现代派诗人对传统的抒情所作的否定之所以是片面的，是因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然，时代变了，人们感受的方式变了，这就是现代感性，抒情的方式也要变，变成一种更高形式的抒情。叶芝的探索正是这样一种富有意义的尝试，前面在谈论叶芝抒情诗的发展时已触及到这一点。在反人性的西方现代文明中，他用抒情来维系个人内心中残剩的情感和尊严，这样，叶芝的抒情诗就与现代派诗歌反抒情倾向成了对立面。当然，叶芝其实并不排斥现代派诗，相反，他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

思想和技巧的特色，丰富了自己的抒情诗。恩格斯指出，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对我们研究叶芝抒情诗的发展，这段话具有很大的启迪。

批评家廷德尔说叶芝的“抒情诗中往往是对立的统一”，其实他的抒情诗本身体现了现代诗歌发展中即对立又统一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叶芝的抒情诗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而且，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对于某些精神部门是敌对的，例如对于艺术和诗歌，就是如此。这种敌对是多方面的，拿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说，商业化的小说，粗制滥造的影片等等，对广大群众的腐蚀无孔不入，对现代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小说这一形式代表了“近代社会的史诗”（黑格尔语）的时代里，现代诗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手法还面临着其本身的局限，而诗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或许也只是“抒情”了。现代派诗人在诗的技巧上作了种种努力，结果之一是文学的两极分化，往往只能拥有一小部分“高雅”的读者。这样，当现代派的浪潮过去了，叶芝仍然屹立着，让我们深思。

谈叶芝的抒情诗，似乎总还得谈叶芝的抒情的立场问题。一般说来，叶芝的立场是偏右的、保守的，有一种贵族主义思想。叶芝认为贵族阶级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能够保护艺术，并使公众获得修养以欣赏文化艺术。他的思

想体系是复杂的，有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维柯^①和斯宾格勒^②的学说等组成部分，总体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象《驰向拜占庭》、《丽达与天鹅》等作品中的唯心史观，就使叶芝站到了历史的进步的思潮的对立面，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思想有时给他的抒情作品还带来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叶芝毕竟是因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绝望而向后看的。象叶芝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他既不可能老是幻想，也不可能老是绝望，他总是要为自己在精神上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哪怕只是自欺欺人的地方。叶芝有他的阶级性、局限性、但又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这正是他自己的悲剧所在。西方的读者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人们常问，我们时代的一个诗人怎么能看不起这个时代而又写出真正合时的诗呢”？

是的，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在缺乏真正革命的文学的情况下，倒是那种敌视资产阶级社会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反而能产生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作品。叶芝对现代资产阶级是敌视的，他的唯心史观使他从保守的立场上“看不起这个时代”：他是真诚的，他需要这种哲学和道义上的义愤来批判资产阶级，否则他的作品就

① 维柯（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新科学》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② 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他的名著《西方的衰落》预言了西方文明的没落。

不会有热情。所以说他不得不站到这样一个“高度”上。他是幻灭的，但又得保持他的“幻象”，他的二十世纪的“塔”不也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吗？这座“塔”毕竟使他与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距离，使他能较清醒认识这个社会的弊病。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作品中“回到自然”的倾向，也是一种向后寻找更高理想的表现。叶芝对现代资产阶级更绝望，绝望的反冲力因而就更强，也就被推得更远了。正因为叶芝是从这种立场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他的批判中包含着他的谬误（甚至还有反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另一方面，只要这种敌视——从敌视而产生的批判存在，我们也就应该研究。

和其他伟大的诗人一样，叶芝的作品中复杂地体现了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往往不是他意识到的，也不是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译者在这里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力去理一理这些复杂的关系，结论该由读者们自己去做。